

中国水墨艺术 之困局与涅槃

◎ 缪肖俊 Miao Xiaojun

上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大潮和丰富多彩、具强烈视听震撼力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水墨这一千年古技将何去何从？其深蕴的传统文化优势与语言资源是否能在现代泛文化语

境中再次焕发光彩？转换，使本土文化向现代变形，使水墨画能够得到世界性的认同和传播，使其成为国际画坛的一个重要资源。而在我们看来，水墨画是我们本土滋生的最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它在传统的基础上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

真正意义的“现代形态”向“后现代形态”转换是在90年代以后。这次转换不同于前两次之处在于：它不是传统水墨的顺延与发展，而是以颠覆、解构与调侃的姿态出现；把水墨画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或文化符号来利用，改变了水墨画的存在方式。由于此次“颠覆”的到来完全摆脱了陈旧观念的束缚，因此它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开放意识和“兼容性”。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更加接近了当代文化语境，从而获得了一种在国际间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就中国画自身而言，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变革。此次变革中出现的画家如晁海、刘庆和、刘进安、陈钰铭、张江舟等。这里我们更应该提到刘进安在水墨实验中所产生的艺术价值，他的水墨语言不仅适合于表现具体的人与事，更能够表现抽象的人和虚构的世界。

中国水墨画这场彻底变革是令人振奋的。也许它仍未能完全解决中国水墨艺术“继承与创新”、“精英传统”与“大众文化”、文士个人情感表达与社会人文关怀等诸多矛盾，但至少我们已见曙光。

境中再次焕发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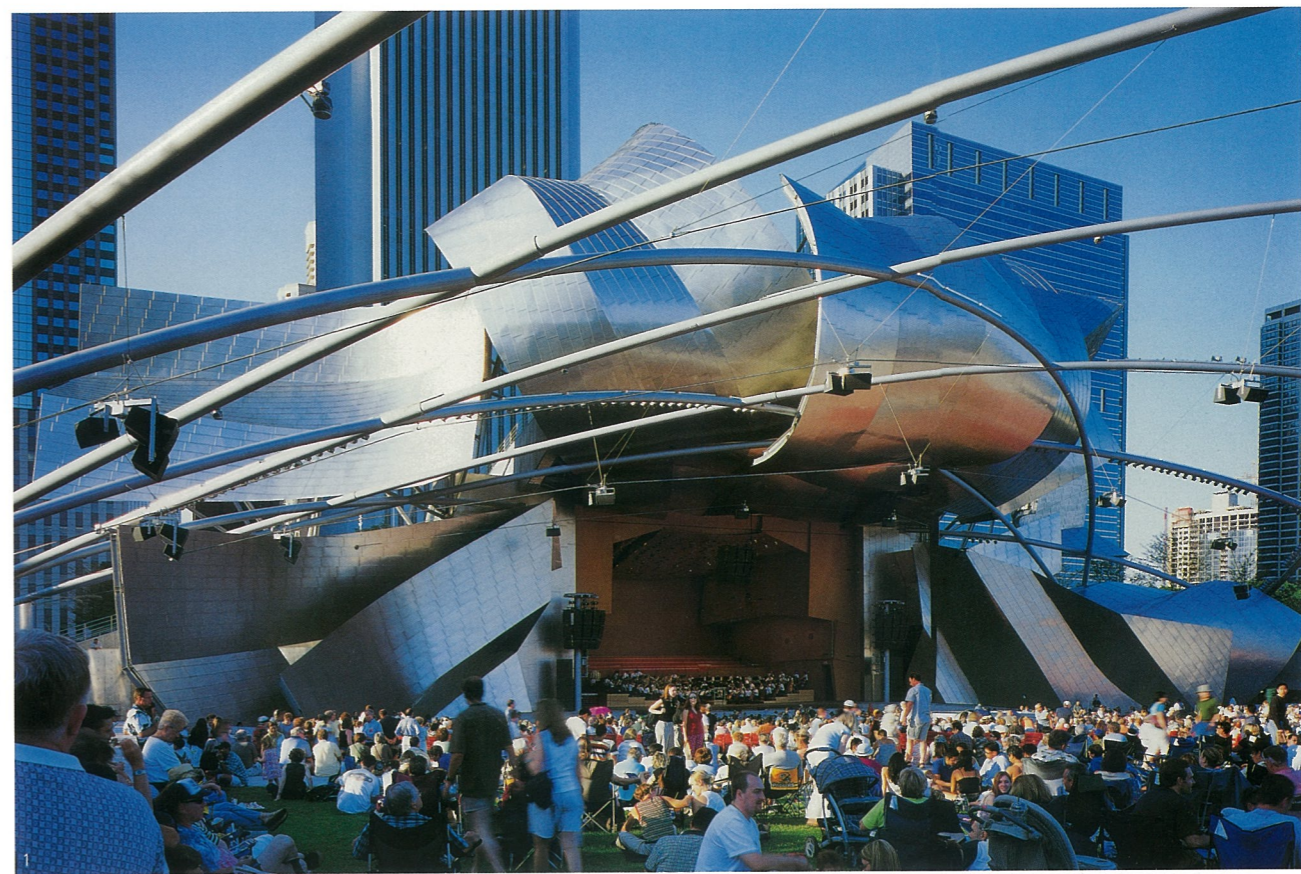
回思中国水墨画的发展进程，发现我之困惑并非独有，应该说中国水墨艺术之困局已有百年，而水墨自求涅槃之路也因之而求索了百年。中国画近百年的革新中，每一次的转换都赋予水墨画以新的内涵。

第一次变革是以“五四”运动为背景，对传统和文人画提出质疑，特别是徐悲鸿从法国回来正式开始了从写意到写实的过渡。50年代到70年代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又出现了“现实主义新国画”，在当时较有影响力的画家是方增先、刘文西、李延生等。

第二次变革是从80年代开始的，这一阶段的水墨画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其特点是水墨画在不超越材料的前提下融入了现代的元素。这一阶段作品的情感发挥也优于往常。其间出现的水墨人物画家有周思聪、刘国辉、郭全忠、聂鸥、李世南及王迎春和杨立舟等。

这两次变革确实给水墨艺术带来了一定的新气象，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水墨画在这两场变革中一直以西方绘画作为参考。先是西方古典写实的模式，从写意到写实，接着又以西方现代艺术为模式，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路子无可厚非，但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仍不过是在传统水墨的文化符号内加进了西方现代派的若干表现因素，也很难完成水墨画的现代转换。因为传统文人画的文化内涵与形式是以文化符号为依托的，人们一般很难在泛泛修改的状态下，从根本上改变其内涵与形式。基于此，我认为现代水墨画的改革，最重要的还是要面对当今的文化现实，去寻找新的艺术话题和文化符号。也就是说，中国水墨画面对的裂变与改革并非只是面对西方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寻求古典意蕴的现代

1-2、静物 纸本·水墨 邹建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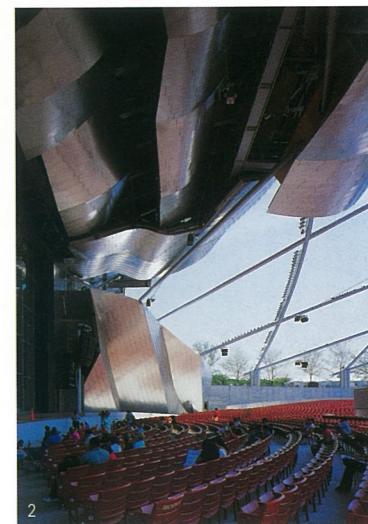
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今年递交了他的又一份充满幽默感的钢铁造物——千禧公园普里茨克音乐亭。名曰亭，其实是有四千多个座位的露天音乐厅，厅前的大草坪更可以容纳七、八千人！音乐亭位于密歇根湖沿岸的密歇根大街和哥伦布大街之间的格兰特公园内，这里将是格兰特公园交响乐团和管弦乐队举办音乐会的特别露天舞台，同时也可以举办爵士乐、布鲁斯和其它世界性音乐会。

盖里的作品一贯新奇刺激，追求一种使人振奋的礼堂效果。如果从正统的审美观出发，难免会有怪异不经之感，但若以当代人的审美经验来品味他的设计，则可能领略到一种类似于雕刻之美的艺术效果。难怪专家们在描述盖里的“建筑”时，常常会使用艺术界的词语，比如雕塑、拼接、组合等。

音乐亭也沿袭了盖里式建筑的风格，被特意设计为新千禧公园的焦点景物，外型抢眼，极易让观者产生“七步生莲花”的联想。建筑物外部覆盖有晶莹剔透的不锈钢板，内部则

采用道格拉斯杉木修饰。周围街道上的行人可以直接望见它。音乐亭还配备有一系列的轻便式升降器，可供一个有120个音乐家的管弦乐队演奏，同时还有一个可让拥有150个成员的唱诗班进行表演的合唱队阶梯。后台区

- 1、千禧公园普里茨克音乐亭
- 2、千禧公园普里茨克音乐亭西侧



Glancing Over Gehry 浮光掠影谈盖里

◎ 编译：陈都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hen Du